



学术文丛
XUESHU WENCONG

BIJIAO KAOGUOXUE SUIBI

比较考古学随笔

● 李学勤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比较考古学随笔

李学勤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比较考古学随笔

李学勤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1 字数:168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633-2447-X/K · 088

定价:9.80 元

序

李学勤先生集合近年所著论文 20 篇，总题曰：《比较考古学随笔》。他在引言中提出比较研究应该有 5 个层次，即是：1. 中土不同时代的比较；2. 中土与边缘地区的比较；3. 中土与邻邦的比较；4. 中土与太平洋地区的比较；5. 中土与其他古文明的比较。渐次推进，可说是由近及远。他不是一位纯粹主张传播论者，而是实事求是，揭橥一些在不同地区而有某种相同的文化现象，作出极有启发性的提示。本书所指出的 20 件大事都是富有兴趣而能够引人入胜的古史上的重要“问题点”。李先生与我多年知好，他认为我在古史的钻研方面和他有一些相同的倾向，故此引为同调，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几句话，真使我受宠若惊，既有了“共同语言”，我亦不辞“佛头著粪”之谓，斗胆地答应了。

先民在踏入农业社会以前，有一段漫长的狩猎时代，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是行国，还不是居国，如果在气候变化或者大型的军事行动发生时，人口必有很大流动和转徙，虽是天南地北之悬隔，由于传播的结果亦可出现一些相同的东西。近代的古史学者，很喜欢从东西两个极端作出比较的论点，从王国维的古籀分东西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以至近时的文字上象形指事的東西说，已经成

为一套滥调，反之，从南北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如凤毛麟角。李先生书中对江西的吴城新干和百越文化所受到北方的影响，有十分有趣的分析，真是巨眼若烛。最近香港南丫岛大湾濒海地带竟有带钮牙的玉璋出土，和二里头及陕西神木的牙璋很相像（但与本书所谈的三星堆蜀国式的岐尖加饰的牙璋不同），而大湾的彩陶纹样与湖北大溪遗物有类似之处，亦足证明中原文化之南被。古书所说“五十万人守五岭”分明是夸大的话，但先秦礼器的传播远及海澨，正可为南北交流提供一物证。

李先生谈规矩镜、日晷、博局都是八极纹三位一体，我尝推测安徽含山玉龟里头所夹的玉片上面的纹样即指示八方、八极，是空间观念的表现而不是历法，玉片镌刻的小圆点作数字的排列，可与河图洛书比较，而玉版夹在龟背中，不啻是“河图玉版”的写照（文见拙作《史溯》）。

谈及西北丝路，李先生指出虎噬鹿器诸动物纹样与斯基泰文化的关系。按 Scythian 即是所谓塞族，本称 Saka，其名见于出土之古波斯文石碑。斯基泰本为波斯国之一省，Saka 于埃兰文（Elan）作 ša-ak-ga，阿卡得文（Aecadian）文作 gi-mi(r)-ri，希腊文作 ε(s)kiθgs，与西北民族有甚深之血缘关系。周原召陈村出土蚌雕外国人头像头顶镌一卐字，有人说即是塞族。我曾指出这个卐的记号在西亚公元前 5500 年前 Halaf 地区的陶器和女神肩膀上亦刻有卐的标识（说见拙作《丝绸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西亚与中国交往在近年考古学上的物证像玛瑙珠在滇池区域出土之多，只江川李家山墓地即有 8079 枚

(详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广东南越文王墓的银盒,已被证明为波斯 Xerxes 一世(公元前 485 年至公元前 465 年)时期的遗物。中外文物交流的年代已可推前,早期商业贸易的记载包括陆路与海道,如《魏书·西域传》所说:“大月氏世祖时,其国人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玻璃。”《梁四公记》说:“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太平广记》卷八一引)。我们看楚滇各地的玻璃器,以至广东肇庆战国墓和南越王墓出土之琉璃,均可证明上面的记载,事实上在先秦时代已是如此。吴时薛综上疏有云:“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奇物充备宝玩。”南越王墓中的各种宝玩正说明海上商贩在西汉初期已是相当发达了。

杨希枚兄分析西北冈出土的 398 具人头骨的复杂性,其中有海洋类黑人种,第五组他怀疑与印度人的头骨很接近,又证明有 23 具几乎无殊于欧洲的类是高加索人种。我在 1973 年考证印度的 Cinapaṭṭa 与蜀布的关系,附带提到昆仑舶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已成为热烈讨论的课题。张秉权著《甲骨上黏附的棉布》一文指出殷代出土龟甲杂有棉布,即土卢布,相当榜葛刺国所谓兜罗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亦出有棉布,证明身毒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在北高加索山区的巴勒卡(峪)海拔 1000 米墓葬出土丝织品多件,其中文书残片有汉文三行(俄文考古报告,见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此为唐代遗

物,远古情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铜在西亚起源甚早,凸即其初文,楔形文称 urd-du。姜寨第一期遗物出有黄铜片和黄铜管状物,冶炼方法比较原始。甘肃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发现铜器遗址,时代相当于夏。文献的记载像《墨子·耕柱篇》说:“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铸铜始于夏,古代已有此说,和出土文物正可印证。

记得若干年前,故友三上次男博士自埃及考察返国,道经香港,赠给我一些在中东遗址拾得的陶片,我说古代东方陶瓷传入近东,和阿拉伯人经商的香料之路有同等价值,后来他写成《陶磁之路》一书,影响至今。李君书中有二章叙述铜镜在中东一带的传播,描写至为生动。大家习惯“丝绸之路”一名,其实,以某种特产在商业活动上来代表文化之交流,铜镜之路、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和丝绸之路是同样重要的!

我近年研究陶器上的符号,相信新石器时代,老早已开拓了“陶(瓷)之路”,形成东西文化上的接触,三上博士的说法可以推前。从许多相同的陶符分布情形看来,远古时代不免互有交往,我的看法有下列几点:

1. 文字未形成以前,有一段漫长时间,流行某一记号,代表某些吉利、富有的意义,可说是“陶符时代”。

2. 这些同形陶符的传播,东南地区亦会出现,诸夏境内,一向华夷戎狄杂处,正可说明这一现象。

3. 中外亦有不少同形记号,我尝举出凸、卂、⊗……等字为例,说明古代陶器之路早已存在。

我另有专书作详细研究,李先生比较中埃文字发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他很关心这一问题,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为我的书写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报李,李先生必定能首肯的。

李先生此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提出许多崭新有趣的问题,论点十分可贵。他的广博的视野和缜密的分析,加上他有机缘接触许多实物作仔细的考察,所得的结论,不是一般关在屋子里作海客“谈瀛”的人们所能做到的。

本书的出版,无异古史学与考古学二大流结合诞生的一个新果实,是一项重要成就,我想读者看过本书之后,必有与我相同的感受。

饶宗颐

1991年6月

目 录

序	饶宗颐(1)
---------	--------

第一部分

一	引言	(1)
二	青铜器与商周文化的关系	(9)
三	曲阜周代墓葬的两种类型	(15)
四	规矩镜、日晷、博局	(21)
五	三星堆与大洋洲(上)	(29)
六	三星堆与大洋洲(下)	(36)
七	百越的尊、卣	(43)
八	蜀国的璋、鼈	(50)
九	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	(57)
十	续论中国铜镜的传播	(64)
十一	中国和中亚的马车	(71)
十二	虎噬鹿器座与有翼神兽	(80)
十三	新西兰玉器的启示	(86)
十四	甲骨占卜的比较研究	(95)

十五	印第安人的“饕餮纹”	(103)
十六	土墩墓异同论	(112)
十七	早期的铜器、铁器	(120)
十八	古埃及与中国文字的起源	(129)
十九	“片云咸”的故事	(136)
二十	中、日、英三国出土木简	(144)

第二部分

二十一	乾隆帝与古玉	(151)
二十二	余杭安溪玉璧与有关符号的分析	(157)
二十三	论养侯玉佩	(165)
二十四	鸟纹三戈的再研究	(171)
二十五	谈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化	(178)
二十六	商代青铜鼉鼓的考察	(187)
二十七	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	(196)
二十八	越南北部出土牙璋	(205)
二十九	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	(210)
三十	爱尔兰出土中国印章的传说	(224)
原版后记		(227)
简体字版跋		(228)

一 引 言

这本小书在标题上写出“比较考古学”的字样，目的并不是要杜撰一项学科，藉以标新立异。我的想法只是要强调一下比较研究在考古学中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这种研究方法，致力于有关的探讨，使考古学——特别是中国考古学获得更丰富的成果。

比较研究方法在文史方面的运用，可以说由来已久。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史、比较史学等名词，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中国学者对历史文化领域如何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有较多论述。例如周谷城先生的《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说：“比较研究，即经常拿彼此不同的东西对照看的意思。这样作，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例如‘古典时期’一词，原来本是只适用于希腊、罗马。但学者们为着要完成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体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国、波斯等，也纳入古典时期之下。”他还列举了一些事例，然后说：“……这类情况，我们如果不采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自始即读世界史，而不研究一点中国史，换句话说，即不拿中外历史对照着看，就很不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作进一步的考虑，或更切合现实的考虑。”他提到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讲到6个古文化区，即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区等，有分区并立，其反面必然是往

来交叉,“如果不用比较研究或对照看的方法,则不易看出其重要性,即使看到了也不易从正面突出,给予应有的叙述”。

考古学的情况更是这样。周谷城先生提到的几个古文化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考古的探究上的。即使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之内,还可存在若干种文化,彼此并立,互相融会交流。对这些文化的同异,有必要进行比较考察;对不同的文化区的同异,也应加以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方法在考古学领域内,实在是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和国外的考古学有着各自的渊源。现代考古学在欧洲形成,是在 19 世纪前期,其前身是所谓古物学(antiquarianism)。中国的考古学则是在 20 世纪前期现代考古学传入后建立的,它的基础乃是传统的金石学。金石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为考古学的兴起准备了丰富的凭藉和材料。同时,中国幅员广阔,文化绵远,地上地下有非常弘富的文物宝藏,更使中国考古学有强烈的自身特点。中国考古学者每每局限于国内考古的知识和经验,外国考古学者又多因语言障碍,不能直接吸收中国考古学的大量内涵,结果是双方难以沟通,妨害了比较研究的开展。

要把中外考古学真正沟通起来,仅靠考古报告和论著的介绍、翻译是不够的。必须对古代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作通盘的观察,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为背景,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这样,就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的同异,揭示一些文化间交流影响的关系,并对各个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恰当的估计,这正是比较考古学设想达到的目的。

比较研究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事实

上,几位为在中国建立现代考古学作出贡献的学者,都以博大的眼界,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运用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李济先生,在分析安阳殷墟的商文化时,曾广泛对比当时所有的国内外考古材料。他1929年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上的《殷商陶器初论》,引了罗斯陀夫柴夫(Rostovzeff)和博罗夫加(Borovka)的著作,以商周青铜器的饕餮、螭龙等花纹与西伯利亚的动物纹饰艺术对比,反驳了商周花纹受北方影响的论点,指出商周文化与北方确有关系,但系商周影响及于北方。1932年他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发表《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更引用许多国外材料来对照。如他根据英国柴尔德(Gordon Child)对欧洲青铜文化的论述,指出“金属材料只有到最便宜的时候才用着作箭头”,因为箭头一般是不能回收的,殷墟铜箭头的大量出现表明青铜工艺的发达。他这篇文章最后说:“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他的这一推断,现在已由多年来的考古工作证实了。

夏鼐先生的许多著作,都以世界考古学的成就作为研究的参照。如他对“丝绸之路”作过深入的探讨,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书中自述在“丝绸之路”东端西安做过考古工作,又曾沿河西走廊调查试掘,直到汉玉门关遗址,还去过新疆调查;他也访问过“丝绸之路”西段,包括伊拉克、伊朗的古城。他指出“中西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并不是单方面”,中国输出丝绸等项,也输入了毛织品、香料、宝石、金银铸币和金银器等。夏鼐先生就中国境内发现的波斯银币和拜占廷金币,曾撰有一系列研究论文。

以上所举,不过是一些例子,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考古学时,都应用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就某种文物作具体比较的情形较多。比较研究适用的范围极广,只要是两种以上的文化,不管是对文化的整体,还是对文化中的某项因素,都可以进行比较。可以对照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也可以对照中国境内的不同文化。我觉得,在中国考古学范围内展开比较研究,不妨分为下列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

这里说的“中原”,比有些人理解的更为广义一些,是指从陕西关中以至黄河中下游一带地区。古代自虞、夏、商、周,汉、唐盛世,王朝建都均不出这个地区的范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考古学早期的工作地点,主要也是在中原。

中原的考古文化,并不是只有单线的发展。这方面的认识,在古代史的研究者间已有先驱。比如《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所刊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就主张“三代(夏、商、周)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种东西两系的观点,至今对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仍有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是相当复杂的,如果简单划为两系,未必能反映实际。古代这一地区的人民究竟应如何划分,很值得通过比较研究去考察。即使是在秦统一以后,一些文物之间的文化联系,也应当通过比较来探索研究。

第二个层次,是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

这里说的“边远”，是就古代的历史情况而言，也可叫非中原地区，即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中国从来是多民族、多区域的统一体，研究历史文化不能脱离这一前提，但是以往很长一段时间，边远地区的考古工作进行不多，对当地的文化面貌了解有限。这种情况，在近年已有根本的改变。现在全国各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数量已经超过4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其密集和广泛，更是前人难于想象的。过去学者多认为商文化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如今看来，这种文化的影响范围要广大得多。以商代青铜器的出土而论，北到内蒙，东到山东，西到陕西和甘肃一带，南到广西，其器物均有商文化的特点，表明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

苏秉琦先生近年提倡考古学的区系研究，他所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不少论文都是运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其中有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一篇，以黄河、长江流域古文化区系与《尚书·禹贡》九州对比，指出古人的九州划分古老而真实，“视角是处于凌驾诸区系之上的中心位置的俯视角，其视野所及之天下正与中华两河（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圈相当，其中，九州分野又与各历史文化区大体一致”。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当然，中国的疆域尚不限于《禹贡》的九州。

中原与边远地区文化的交流影响，是双向的。在中原以外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原也能找到来自边远的文化因素。比较双方的异同，使我们能更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程。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

由于地理的接近，人民的往来，同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自当推中国周围的国家地区。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

过探讨,例如以中国北方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与西伯利亚的文化比较,以中国南方发现的靴形钺、铜鼓与东南亚的文化比较。再如中国与日本间的文化交流,两国学者长期以来从考古学方面加以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课题。这一类实例,可谓不胜枚举。

第四个层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

上面谈到的中国同邻近文化的比较,自然也包含了这个层次的一部分。

太平洋的周围,有亚洲的东部,有美洲,也有大洋洲。地理大发现以后,位处旧大陆的太平洋沿岸的东亚、东南亚,与遥远的美洲等地古代有否往来,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古代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其影响曾否远越重洋,引起学者许多推测。章太炎写过《法显发现西半球说》(《章太炎全集》四),云公元5世纪中国僧人法显至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尚有支那(中国)文物制度之蜕形”。随后有类似想法的论作颇多,外国也有持这种意见的作品。无论将来能不能证实往来关系的存在,对环太平洋各地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肯定是有益的。

第五个层次,是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

这里说的,是指古代独立形成的各个文明,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Glyn Daniel)在他的《最初的文明》(The First Civilizations)中曾有讨论。中华文明,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代文明之一,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发展。但正如前述夏鼐先生的书所讲:“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对照分析,

去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爱尔丽举行了题为“古代中国与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的学术讨论会,不少论文即以中国与近东、美洲的古代文明作出比较研究,有所收获。

在这种比较研究上,应该反对唯传播论的观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历史前进到类似阶段时,会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艺和美术的创造,不可把这种现象一律视为传播的结果,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同时又必须承认,古代人民的活动范围每每胜过今人的想象,文化因素的传播会通过若干环节,达到很遥远的地方。这里要求实事求是,也就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比较研究还可以从更广义的方面去理解。不同文化的类似因素可供对照比较,同一文化里的不同因素(例如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干的几种器物)也可供参照研究。有意地利用这种方法,将会使考古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如果这种方法能为多数学者接受运用,有可能成立新的学科分支,即比较考古学。

比较考古学还没有成熟,在中国也没有这方面的系统专著,确实是有待开拓的园地。我自己知识和能力都有限,只是对此心向往之,随手写了一些读书笔记。现在选出一部分,加上这篇引言,共成20节,提供给读者,以示对这一研究方向的提倡。这些其实都是小文章,题材、体例未求一致,内容彼此也没有多少联系,因此书名就称为《随笔》了。其中不妥、疏漏之处,切望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周谷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光明日报》1981年3月24日。